

消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性 焦虑并重塑文化认同

刘颖¹ 李雪松²

(1. 北华大学师范分院 吉林 吉林 132013; 2.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焦虑”伴随着其现代性追求与后现代批判一路并存。自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近代时期起,中国思想进入多元碰撞期,空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高等教育领域的文化“焦虑”现象,在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症结的同时,也相对制约了高等教育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历经百余年探索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萌芽、成型、发展、巩固、繁荣的历史阶段,已基本完成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比、追、赶、超”,国际化融合程度逐渐加深,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高等教育仍需要继续坚定文化自信,建立包容、开放、普适性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持续增强国际影响力,与国际接轨并重塑文化认同,以提升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化话语权。

关键词: 高等教育; 现代性焦虑; 文化认同;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20)11-0016-05

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地位已成为国家实际国力的彰显,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国际地位和文化“话语权”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议题,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跻身“世界强流”的殷切期盼和愿景写照。囿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世界高等教育知识生产格局中的实际处境,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国际文化话语权建设仍面临着强烈的现代性焦虑,既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也成为其发展的限制和制约。要化解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性焦虑,需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主动融入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坚定文化自信,秉持文化自觉,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形成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

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性焦虑”发源与文化认同危机

焦虑作为心理学概念,1910年由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首次提出,是指个体面对现实或未来事物出现严重恶化趋势时,所产生的紧张、不安、忧虑等情感状态。结合弗洛伊德的观点和国内外主流学术观点,焦虑的产生机制可以描述为:个体基于信任通过“自我”与外界环境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获取本体安全满足,实现心理安全防线的构建;当个体面临外界威胁时,会在生理、心理、神经等方面产生焦虑这一警示反映,为心理安全状态提供防御机制,防御过当则会

导致心理疾病的产生。社会焦虑可以视为个体焦虑的群体性集合,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会引起公众的焦虑反应,主要表现为群体的紧张不安情绪,属于社会心理疾病^[1]。由此可知,社会秩序的瓦解重构、文化生活的变化迁移均能导致原本的心理安全防御机制发生适用性变化,从而造成社会焦虑的产生和加剧。如今,社会焦虑已经成为跨国界、跨意识形态、跨文化的普遍性问题,成为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典型矛盾现象。究其原因,与国际社会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割裂以及在此过程中高频率、高跨度、高强度的社会变动跨越有着紧密的联系。当变动成为现代社会的固有标签和普遍性症结时,社会成员不得不动且常态化地进行自我状态的调整 and 适应,以重构自身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安全信任边界。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性焦虑与近代中国的社会焦虑共生共存,是社会焦虑在该领域的细化和派生。

不同学科、不同思想派别、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和描述不尽相同。当前的“现代性”是指起源于启蒙时代的“新世界”体系生成时代,是一种持续进步、合乎目的性、不可逆转的发展时间观念,与“理性”密不可分,是现代与传统的相对和断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中指出,现代性焦虑来自某种悖论,即理性能否提供对世界的可靠性理解,而这种可靠性会因理性的怀疑特质被消解,由此疑虑现代性能否以科学理性为参照。这一观点尽管对理

收稿日期:2020-08-13

作者简介:刘颖,北华大学师范分院讲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家庭教育;李雪松,黑龙江大学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解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性焦虑有参考意义,但并不能完全概括。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的“被现代”性质。中国的“现代性”是其由原发国家向后发国家蔓延扩散的连锁突变现象;在现代性参照系的问题上,中西文化整体呈现对立状态,双方话语权二元争衡的现象始终存在^[2]。清朝末年,中国被裹挟进入现代性大潮,被动地迎来了社会结构性的颠覆和变革,在与西方世界文化思想的碰撞中扮演“追随者”和“依附者”的角色。习惯了“天朝上国”的自我优越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得中国人民急于摆脱民族危亡、社会颠覆的危难困境,然而面对作为“先行者”的西方列国,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其“追随者”的角色存在历史必然性,民众的主观意愿未能实现社会环境的稳定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超越,由此导致社会集体精神失范和群体焦虑问题。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救亡存图的斗争史,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同样面临着从科举制到学校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性焦虑”来源于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群体焦虑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即时性反应。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为身处剧烈社会变革中的国人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1895年,中国近代教育面临“科举”与“学校”之争,高等教育“中学”与“西学”的取舍争议日趋白热化。教育家严复在《救亡决论》中主张“大讲西学”,全盘西化,倡导教育体系以“西学”替代“中学”,并认为其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1898年,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倡在物质层面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现代化问题上遵守中华文明,厘清了中国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根本思路^[3]。近代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经历了由“天朝上国”的民族优越感到全面否定自我文化个性,摒弃身份认同,由此产生的群体焦虑同样蔓延至以高等教育体系为代表的教育领域。因此,高等教育现代化面临着教育制度变革、文化认同“重塑”、群体焦虑化解的历史使命。

文化认同是个体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生活所形成的民族价值认同,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和生命基因,过度崇尚外来文化价值而否定自身文化足以引起国家政治制度的分崩离析。高等教育“现代性焦虑”诞生于中国近代史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是“文化撕裂”导致的群体“文化认同”没落,反映了社会公众急于快速摆脱传统模式桎梏的殷切期待。中国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嬗变,高等教育体系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需求。1862年,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入学资格有科名、官阶、年龄等多重限制,课程以外国语言文学和西方近代学科知识为主,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高校。1866年,中国第一所科技专科学校、技工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创立,推动了中国近代

教育的兴起。1895年,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西学学堂”在天津创办,为建立中国高校体系率先垂范,将中国延续千余年的封建教育画上了终止符。1898年,诞生于戊戌变法“新政”之一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帷幕正式拉开^[4]。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诞生于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发展高等教育是国人谋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实现教育救国、文化强国之路径。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产物,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性焦虑自新式大学诞生起就贯穿其发展过程。由于受长期战乱和外来侵略的影响,争取独立、摆脱落后成为全民族的共同精神诉求,近代大学成为拯救民族危机的文化工具。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焦虑”是贯穿其发展路径的鲜明标签;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文化产物,中国高等教育急于快速摆脱“追随者”和“后来者”的角色地位,近百年间的课程、制度、体系建设全面接轨国际先进高等教育模式,整体呈现出明显的依附特性,逐渐摒弃了自身的文化个性^[5]。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中,虽然西方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确实起到了参照的作用,但脱离该体系将会导致中国高等教育陷入参照焦虑。作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后发国家,急于摆脱依附地位的现代性焦虑导致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速度求快、目标求高、过度关注发展绩效等建设偏差。要转换中国高等教育身份地位、实现“超越”和“领先”,亟须在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先进性的同时,结合本国社会环境的实际需求、文明基础以及自身的文化个性,从而实现文化认同的重塑。

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性焦虑表征

1. 频繁模式移植导致的文化个性迷失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和国家文明一同被裹挟进入现代化浪潮,伴随着现代性焦虑,高频率效仿、移植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主旋律。1862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自京师同文馆发轫,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制度等方面都全面移植西方高等教育模式,采取广泛效仿西方的“泰西模式”,主要针对民族存亡危机下的实用型人才培养;而新式学校由政府主办,没有明显的结构层次,是基于封建制度肌体的现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承载着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愿景。囿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传统教育观念,该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注重器物层面的效仿和借鉴,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高度西化的日本使国人认识到学习西方制度文化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始移植日本高等教育模式,从理论到制度纷纷进行效仿,以培养政治改革、工商业、科技发展等所需的专门人才,实现社会转型和民族自救的历史使命。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其高度移植了日本东京大学教

育模式。在这一阶段,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实现了从器物效仿到制度模式移植的跨越,但无论是泰西模式还是日本模式下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均以培养行政官员、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根基为目标,都未能摆脱为封建政治体制服务的传统教育理念,均为“中体西用”思想的教育产物^[6]。

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以德国洪堡大学为蓝本构建中国特定话语方式下的大学理念、教育宗旨,带领北京大学实现了从京师大学堂到现代新型大学的历史性跨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始进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德国模式,服务于专制政治的教育模式由此终结。1920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效仿对象由德国转向美国,于1922年公布的“壬戌学制”将办学模式全面移植为美国模式,郭秉文执掌的东南大学成为这一模式的代表;直至民国落幕,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一直沉沦于对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全面模仿^[7]。新中国成立初期,囿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中国开始以构建适合工人阶级领导和国家建设需要的高等教育,全面效仿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国家高等教育模式。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后,中国大学进入自我封闭和独立探索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高等教育再度成为美国模式的“追随者”。

从1862年到1978年的百余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先后经历了泰西模式、日本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苏联模式的快速移植变迁,移植过程全面接纳而忽略批判性吸收,导致中国高等教育始终处于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摒弃、再移植的循环过程,由于随着国际局势变幻而不断更换模仿对象,致使始终未能形成具备自身文化传承及文化自信的高等教育体系,直至改革开放后重新回归美国模式,在自身发展模式的探索上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抉择。在移植西方高等教育模式期间不断更迭移植目标对象,导致在西学东渐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文化个性,本土文化内涵逐渐模糊,自我更新能力日益下降甚至丧失,重塑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认同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现实挑战。

2. 急于摆脱依附者定位的功利性发展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诞生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功利性目的,其历史初衷是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模式移植,也大多是为了满足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统治阶级权力的需要,注重高等教育对现代化建设的实用性服务功能,并将其运用至高等教育模式移植的核心理念中。建立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和发展需要的特色高校,重塑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文化根基,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梁启超、胡适均对当时高等教育严重依赖翻译、留学等现象提出过批评,认为器物层面的效仿仅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过渡转型,号召将中华文明繁荣复兴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中,建设比肩世界一流水准的现代化高校,重塑中国学术文化在

世界学术思想界的领先地位^[8]。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推移,使中国高等教育对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依附和追随更为严重;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涌起,教育界对全盘移植效仿、不加扬弃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严肃批评,但未能提出有效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的方案,缺乏历史实践的有力支撑^[9],导致摆脱依附追随、重塑学术领先地位的现代性焦虑始终贯穿于中国高等教育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中。

进入21世纪之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始终较小,毛入学率长期处于个位数水平,学科专业结构和教学体系残缺不全。作为源自外部世界刺激和诱导下的后来者,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始终扮演着“追随者”和“依附者”的角色。为了加速摆脱这一处境,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一度出现了速度求快、目标求高、过度关注发展绩效等建设偏差。根据国际认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时属于精英教育,15%—50%则为大众化阶段。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于2002年达到15%,提前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部统计数据示,截至2018年,全国高校数量达2663所,各类高等教育在学学生达3833万人,毛入学率为48.1%。高校连年扩招带来的直接结果,一方面是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加速推进,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教育质量下降、人才供求体系扭曲等新问题,具有高度迎合社会、经济、政治建设的功利性。大学城是中国高等教育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大学区域化聚集形态,是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普及的物理空间形态。大学城有自然生成和人为构建之别,中国的大学城通常是人工规划构建的产物,但需要正视的是,大学城在扩大高等教育供给、加速城市化进程时,若发展价值观错位、盲目建设则可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3. 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术话语权失衡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其一脉相承的现代性焦虑却未能得以消解。有乐观评论认为,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已经实现了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并行甚至跨越,但实际上,由于数百年来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世界文明体系和学术话语权已被西方世界牢牢掌握,西方学术则牢牢控制着国际学术研究对话。中国高等教育在西方学术霸权下被迫边缘化,这与实现与国际先进高等教育体系“并肩”甚至“超越”的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以美国教育专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的“教育依附论”主张最为典型。他认为,国际知识生产格局存在不平等性,在金字塔结构的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欧美国家占领着塔尖和世界知识生产的中心位置,面向世界输出高等教育模式标准,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塔底和世界知识生产格局的边缘,二者之间的依附关系难以扭转。而以英语为特定语言媒介的国际文化交流方式又进一步使其巩固化,发展中国家

高等教育超越发达国家的前景不容乐观。该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中国作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后发者的现代性焦虑表征。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迫切期望融入世界体系中,并接轨国际一流水准,然而,过度追求世界高等教育排行榜优异名次,急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受困于短期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平衡与取舍,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新的群体性焦虑。

三、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性焦虑的消解与文化认同重塑

1. 张扬文化个性,重塑文化认同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投入扩大、建设力度加强,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间的差距正显著缩小。文化认同直接关系到国家凝聚力的塑造、培养与延续,是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重塑文化认同、秉持文化自觉,构建包容、开放、普适性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主动融入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为了强化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紧紧扎根中国文化底蕴和文明社会根基,将中国文化气质和民族品行融入中国高等教育的话语体系中,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血脉,从中获取高等教育传承与创新的文明火种,探索基于自我文化个性、文化根基、文化积淀和文化认同的良性发展路径^[10]。

一是注重中国高等教育独特文化个性的塑造和保持。在重塑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所凝结的历史瑰宝和精华,剖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重塑中国高等教育文化个性,需要持续丰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文化内涵,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保持自身文化个性避免外部庸俗文化侵蚀。发扬不同高校办学优势与特色,明确高校定位避免同质化发展。高校文化特色深植于其办学性质、历史文化积淀、师生信念、发展愿景,除了构建中国高等教育共同文化特色以外,还要塑造不同类型高校的文化特色,结合高校自身定位重塑文化特色,实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百花齐放与多样化发展。

二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激发社会群体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与先导性既能够为高等教育文化认同重塑提供根本支撑,也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文化精神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民族精神共识,将其贯彻至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认同重塑的过程中,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能够帮助社会群体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发展成果,增强公众文

化情感认同,坚定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跻身世界高等教育一流水平的文化自信。

三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结合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和教育理念,将爱国主义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入高等教育文化孕育过程,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并主动传承,同时要避免传统文化“复兴”的思维误区,合力创造出既有民族文化自觉又有文化共性的新型文化,构建真正的文化认同。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介质,提升青年学生群体民族认同、自我激励与自我凝聚能力,加强学科建设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功能渗透,并将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提升青年群体个体素质与其在国家社会集体环境中的功能作用,以激发个体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鼓励其主动参与到文化认同、国家凝聚力的建设过程中,以高等教育文化认同推动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增强全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1]。

2. 提升高等教育现代化水平及质量

持续提升高等教育现代化水平,为重塑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认同提供实力支撑。高等教育现代性焦虑源自近代中国民族救亡图存的上下求索,其本质是中华民族对抗外部危机的应激性反应和积极行为,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支撑。作为现代高等教育模式的后来者,消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性焦虑,必须结合本国社会环境的实际需求,遵循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内在逻辑的基本原则,依托自身体系建设与完善,提升高等教育现代化水平和发展质量,将建设世界一流高校和世界一流学科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强力支撑。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总结分析中国高等教育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对历史阶段中的不当效仿进行自我修复,寻求具备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比、追、赶、超的发展路径,正确、理性地看待文化认同重塑过程中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全球化关系,为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变革创新提供发展动力。避免盲目崇拜文化心理下的西方高等教育模式的全盘移植和套用,正确地看待孕育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文化土壤与西方世界的本质区别,重视高校与学科发展的特色化建设,避免唯量化指标、追求排名的急功近利建设思维,优化高校学科评价体系,规范管理高校评估市场,纠正高等教育评估体系中的等级划分认知偏差,实现不同办学层次的高校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以一流水平和质量积极服务社会发展建设。

3. 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

在现实中,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大量理论、概念、术语均为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舶来品”,办学模式、管理体系、课程设计和教学评价等实践领域仍投射出强烈的西方色彩。重塑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认同,消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性焦虑,必须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减少对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

发展依附。随着高校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价值诉求的明晰,高校作为政治工具和文化工具的倾向逐渐得到纠正,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后发借鉴中有了更为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12]。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政治色彩逐渐弱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以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水平为根本目的,借鉴、吸取世界先进经验,扩大高等教育国际对话,致力于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为世界高等教育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构建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中国表达,维持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平衡。要正确地看待西方高等教育体系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话语权和改造作用,借鉴吸收其中的优秀元素并进行本土化转换,注重中华文化的国际表达,强化高等教育参与主体在构建话语体系中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能力,构建精准阐释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核心理念和理论原则的语法规则,系统提炼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理念,形成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中国表达,以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一方面,国际文化交流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应在国际视野下建立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紧密联系和合作交流,积极推进国际接轨,深化改革创新;另一方面,要注重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演绎,避免对单纯某一国家的过度效仿和文化依附,综合吸收不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优势和长处,站在全球格局和视界上完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黄肖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论战与现代性焦虑[J].

河北学刊,2017(4):210.

[2]任平.论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现代性思想解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1):5.

[3]刘继青,王孙禹,鄢一龙.探寻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之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与未来[J].中国高教研究,2017(1):23.

[4]陈兴德.焦虑、认同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J].教育发展研究,2018(23):5.

[5]吴立保,吴芝青.论中国近代大学的文化性格及其现代意义[J].江苏高教,2020(2):17.

[6]董锋,夏泉.“一五”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探索发展的“鉴”与“戒”[J].高教探索,2020(2):103.

[7]程斯辉,李汉学.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质量观探析[J].大学教育科学,2018(1):16.

[8]李辉.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教材建设[J].高教探索,2019(12):99.

[9]唐景莉,韩晓萌,王瑶.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逻辑(4) 国势之强由于人——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等教育发展述评[J].中国高等教育,2019(18):8.

[10]顾志勇.中国高等教育自信:历史积淀、现实基础、政治优势、提升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4):16.

[11]解德渤,等.思维·价值·秩序: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变革之路(笔谈)[J].重庆高教研究,2019(3):70.

[12]别敦荣,亢萌.中国高等教育是如何走向世界的?[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5):27.

Dispelling the Anxiety of Modernity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haping Its Cultural Identity

LIU Ying¹, LI Xue-song²

(1. Beihu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Jilin 132013, China;

2.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xiety” has accompanied its pursuit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 criticism. Since the modern history with the Opium War as the starting point, Chinese thought has entered the period of multiple collision. The unprecedented national crises has caused cultural “anxiety”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crux of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relatively restrict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fter more than 100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germination, formation, development, consolidation and prosperity, and has basically completed the “comparison, pursuit, catching up, and surpassing” of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orming a clos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needs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stablish an inclusive, open, and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improve international acceptan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ight of 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worl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ty anxiety; cultural identity; discourse power